

见效快、疗程短、痛苦小、效果好等特点。治疗二至三度烧伤可不植皮，让其自行生长出新的肌肉和皮肤组织，疗程为二至三周。

第二节 民间气象、环保、地震的预测方法

过去长葛民间主要是看日月星辰、云、风、气温的变化来预测天气的变化。一是看日月星辰的变化，如“日红雨，月晕风”，即太阳早晨格外红就会下雨，再如“八月十五日云遮月，来年十五雪打灯（元宵节下雪）”。二是云的变化，如“早上烧云到不黑，黑了烧云晴半月”，即是早晨有火烧云，必定当天要下雨，如果傍晚有火烧云，就会晴半月无雨，再如“天上圪瘩云，下雨浇死人”，即天空有大片云块出现必定下大雨。三是时间的记述，如下雨的日期多为“三月怕仨七，四月怕初一，仨七初一都不怕，就怕四月十二下。四月十二湿了老鹅毛，麦子水里淘”。其意思是农历三月初七、十七、二十七下雨，四月初一也常下雨，如果三月的初七、十七、二十七及四月初一都不下雨，就怕四月十二日下雨，如果四月十二下了雨，当年收麦时节肯定雨水多。四是气温变化，不论冬天或夏天，如果连续几天生物制品温湿，而且空气闷热，在短时间内肯定下雨，空气闷热的越很，下的雨就越大。五是看风向的变化，在长葛一带一般是刮东南风、东北风容易下雨，民间有“不怕天不下，只要东南风刮的大”，意思是只要东南风刮的大，天就会下雨。东北风刮的大也容易下雨下雪。如果风向转为西北风或西南，天气肯定转晴。六是看建筑物的变化预测天气，如果平房的水泥地或砖土地发潮，或墙基发潮以及水缸下半截突然挂水珠，就预测出天马上就要下雨。七是看动物变化，如蛇过路，成群结队的蚂蚁出窝或鸡天很晚了仍不进窝，就预示天要下雨。八是人的器官感觉，如果人们感到胸闷气短，有一种压抑感，也预示着天气的变化，不是刮风就是下雨。

第三节 民间计量

长葛一带民间计算重量都是用木杆秤，木杆秤有秤砣、秤盘及木秤杆组合而成。木杆秤分斤、两。药房及小份量物品的计量（如草药、颜料、金银等）则用类似木杆秤的戥子或天平。

木杆秤又分大秤（5斤以上直至百斤），小秤（一斤以上）及特小秤（多为药房用，一钱以上）。木杆秤又分新秤老秤两种，新中国成立前为老秤，新中国成立

后改为新秤，均为十六两秤，新秤十加一（即十斤加一斤）顶老秤的重量。到 60 年代改为十两秤。

在计算粮食重量时，在 50 年代以前都是用石、斗、升，合计算重量。10 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老秤（新中国成立前）40 斤为一斗，新秤 50 斤一斗，一石加 10 斤。用木制斗两下算一斗。每升十斤，每合一斤。

民间计算重量时，一般是用珠算计算，一秤一秤打在算盘上。没有算盘就在地下划道，百、十、斤分别在地下划直道，一百斤或十斤、一斤划一道，然后分别加起来再合计。

两的计算有速算法，即“一千两不用算，62 斤半（16 两秤）”以此缩短计算时间。

计算土地的多少。新中国成立前后一般是用木圆规丈量，木圆规下悬五尺，按六十平方丈为一亩。没有木圆规用木尺丈量，木尺有五尺尺有一丈尺，一下接一下丈量，也有用步丈量，一步五尺，有“长十六（步）短十五（步），不多不少看一亩。”

在其他小面积的计算，如量布的多少，量衣服的大小，除用小裁缝尺外，多用手丈量，一乍一跪为一尺，即大拇指和中指为七寸，中指握起用大拇指往前量为三寸。一撑子为六寸，即大拇指和食指伸直为六寸。

计算树木的大小，依照“圆三径一”，即树的周长有三尺，树的直径为一尺，以此类推计算。

第四节 民间制造

一、长葛董村木杆秤

（一）董村木杆秤的发展历程

长葛市董村镇是我国闻名的“衡器之乡”，自明朝末年至今已有四百年的生产历史，且从业人员多，销售市场遍布全国，在国内影响深远。

据史料记载，董村木杆秤制作始于 1615 年到 1635 年间。1865 年成立了长葛“星秤会”，1943 年全县已有秤工七百多人。

新中国成立后，长葛制秤业得以迅速发展。部分长葛秤工开始到郑州、洛阳、邯郸、开封等地经营制秤业，并在省外云南、贵州、内蒙、宁夏、青海、西藏、吉

林、陕西、沈阳等 23 个省、市设立制作点。

1982 年后，生产木杆秤及其配件的专业户，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到了 1000 余家。1985 年全县年产杆秤和戥秤 100 万支，各种秤杆（楠木、果木）200 多万支，定量秤砣近千吨，年产值达千万元以上。董村街的市场交流会逢一、六日，参加经营者有一百多户，经营品种齐全，市场顾客近至本地，远至边疆，口语不同，服饰各异。一个会日的成交额，少则三、五万元，多则十万余元。至此，长葛木杆秤誉满全国。

1977 年，根据国务院的命令，长葛县制造的戥秤改为千克制戥秤。1978 年 5 月，河南省计量局副局长王化龙来长葛主持召开了“戥秤改革会议”，长葛县承担了本省和外省戥秤改革所需千克制戥秤的制作任务。1985 年 6 月，河南省计量局又在长葛召开全省木杆秤、竹木直尺向法定计量单位过渡的“改革座谈会”，制定了公斤秤的样品标准。从此，董村承担了全国长江以北地区的木杆秤生产重任，成为全国两大衡器生产基地之一。1987 年，和浙江永康一起被命名为全国“衡器之乡”。

董村木杆秤技艺系世代口头相传，且传男不传女，安徽计量志中有“长葛三岁娃娃会做秤”的记载。董村木杆秤质地好，做工精细，灵敏度高，量值准确，是北半个中国木杆秤的集散中心。

董村木杆秤，制作工艺独特，结构简单，携带方便。虽然目前，国家限制使用木杆秤，电子秤的推广对木杆秤带来的冲击，使其将面临失传，但在集市和流动贸易市场等仍有很大的使用空间，尤其是董村木杆秤深受个体商户流动商贩钟爱，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因此，传承保护董村木杆秤制作工艺，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创新，提高科技含量，增强大众审美和实用价值，将董村木杆秤这历经数百年之久、数代相传的手工制秤技艺发扬广大，对发展河南经济，振兴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董村木杆秤代表性传承人

1. 陈学增，男，汉族，1934 年出生于董村乡十里铺村。幼年读私塾，12 岁从师赵庚戌老师傅（1890 年生人，在开封设店铺），学徒五年后回乡从事制秤业。1955 年参军，1961 年转业回村，兼生产队会计，边从事生产队制秤业；一九八二年后开始自己家庭作坊，并传艺儿子陈英杰（1964 年生人，高中文化程度），儿媳李梅芳（1965 年），现在，家庭制秤业由儿子陈英杰主理。

2. 赵群智，男，汉族，1944 年出生于董村乡口王村制秤世家。自幼受祖、父影响，5 岁起从事制秤业，并传承于子女。曾参与编写《长葛县志》、《长葛计量志》，著有《闻名全国的“长葛木杆秤”》文章，此文于 1987 年编入长葛文史资料第

三辑。

3. 陈英杰，男，汉族，? 1964 年生于董村十里铺村，高中文化程度，1982 年跟随父亲陈学增学习星秤技艺，年生产木杆秤 7000 余支。在河南新乡市的禾家县、辉县、濮阳南乐、范县设有销售门店。

(三) 董村木杆秤相关制作工具及配件：

1. 锯。铁质，把原木截成规定的短节，再解成板形，长条形木条；

2. 墨斗。木制匣子，一头是盒形，盛墨汁用；一头安装一木轮，绕上一轮线，线拉出经墨盒，着色，在原材料上绷上直线，便于锯木条时不锯斜。

3. (圆刨机) 刮楞机。先刮去毛坯上的四楞角，然后用圆刨将木杆刮成圆形杆，达到木杆光滑圆润。

4. 木钻。钻星孔用“十”字形木质架，底部安有细钢针，细绳绕“十”字架，三端固定，能使中柱旋转。钢针钻出针头状小孔，即星孔。

5. 铜丝：镶嵌进木杆里，作秤星。

6. 割刀 (长方形，有 1 把，比生活用菜刀稍厚，铜质)。铜丝插入钻孔后，割断孔外面的多余铜丝，然后拍实插入孔中的铜丝。

7. 砝码。测定秤杆能定多少重量用。

8. 秤钩。把细钢金条截成短节，放至火炉上烧红，用火钳钳着放在砧子用锤反复敲打，一边粗，一边细尖，然后用钳子捏成弯勾状。

9. 秤砣。铁质，将金属熔化浇入用沙制做的铸型模子成形，冷却后，经过清沙、打磨、上天平测标准定量、着色后即成。秤砣形状有正方体、长方体、圆锥体等。

(四) 木杆秤的种类

解放前，长葛制秤业根据各个行业的不同用途和习惯，制造的木杆秤种类繁多。总的分有盘秤和勾秤两大类。除极少数刀子秤外，大部分是毫纽秤。秤盘多用铁皮制成，唯有卖盐用的秤盘多为铜盘。菜农卖菜和卖豆腐用的是竹篾或柳条编织而成的圆盘。其他铜质或铁质秤盘，有长方形、圆形、鸭蛋形等形状。秤杆多用本地产的杏木、梨木、核桃木、枣木等果



木杆秤

木，果木杆中以密县枣木为上乘佳品。唯大商号用的秤杆为紫檀木。秤砣有铁秤砣、铜秤砣二种，其形状有正方体、长方体、圆锥体、亚腰葫芦体等。

按秤量分，盘秤有三斤、五斤、十斤、十五斤、二十斤、三十斤六种；勾秤有三十斤、七十斤、一百斤、一百五十斤、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四百斤等种类。

按量值分，中华民国以前，基本按各种习惯（因当时全国度量衡制尚不尽统一）制作。据对中华民国时期称量调查，长葛制修的木杆秤有十四种。其中：

库平称，一斤合今五百克。

市平称，一斤合今三百五十克。

直平称，一斤合今三百克。

一斤底秤，又称小加一秤，每百斤比库平称大一斤，一斤合今五百零五克。

三斤底秤，又称小加三秤，每斤合五百一十五克。

五斤底秤，又称小加五秤，一斤合五百二十五克。

加一秤，每十斤比库平称大一斤，一斤合今五百五十克。

加一五秤，每斤合今五百七十五克。

加二五秤，每斤合今六百二十五克。

加三秤，每斤合今六百五十克。

截半秤，每斤合今八百克。

加六秤，每斤合今九百克。

线行秤，每斤合今八百克。

合子秤，每斤合今一千克。

以上诸种都以十六两为一斤分度。另有以十八两为一斤和二十两为一斤分度的，叫十八两秤、二十两秤。十八两秤一斤合今五百六十二点八克。二十两秤和加二五秤一样，一斤合今六百二十五克，不过分度不一样。

按制作式样分，种类更多：有麻毫秤（亦称笨秤）；刀子秤，刀子秤又分内刀式（俗称里上秤）、外刀式（俗称外刀框）、内外结合式（重点或支点刀中有一个是内刀或外刀式）；刀纽结合式（第二组支点为毫纽式）。这几种形式的秤，星点布局各异，表示的量值不一，有以下诸种。

二毫二面秤 一般是第二组以每斤 500 克的量值修制；第一组则根据需要按添加份量制。

二毫一面秤，又叫“儿女争风秤”。它的两个支点使用同一分度量点，传递出

二种不同的量值。使用第二组毫纽时，首位分度值为零，末位分度值一般为一斤；使用第一组毫纽时，首位分度值为三斤，末位分度值为三斤；使用第三组毫纽时，首位分度值为零，末位分度值为一斤。它的最小分度值为一两。

怀斤面两秤 又叫“驴打滚秤”。虽说是二毫二面秤，但其分度示值一反常规，使用第一组毫纽时，须看怀里的分度；使用第二组毫纽时才看上面的分度。

倒负秤 有二毫二面和三毫二面两种。它的零点设在实际零点的前边，一般在负六点二五克的位值上。

二毫四面秤 是按二种量值标准修制的。它的每一个支点毫纽都有二种量值分度，分别是以500克为一斤和以加一五或别的量值分度。

二毫五面秤 一般有四种不同的量值标准。这种秤浑身是秤星，难以辨认，称量的东西究竟是多少，只有执秤人自己知道。

对花秤 多为一毫三面秤，是公道的货栈用秤，以五百克为一斤的量值修制。最大称量一般为三百斤，每个分度点都星制有明显的数字标明量值，怀里一面和背面是相对应的统一分度，使用时买卖双方都可看出示值的多少。

水银秤 是将秤杆钻空，灌入水银后修制的木标秤。量值以五百克为一斤修制，但使用时可将秤杆上抬或下压，其示值则相应增减，是一种“昧心秤”。

这些秤的用途各异，每斤量值小于500克的为银号和首饰楼用秤；每斤量值大于500克的和有底的几种秤，是农贸市场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用秤。线行秤是农民出售手工所纺棉线的专用秤。标准量值和加大量值混制的秤，用途有二种，一是油房、花行和卖豆腐的用秤，他们收购时用加大的量值秤，售卖时则用标准量值秤。另一种是货栈、牙行使用的秤，标准量值是为应付官府检查，加大量值则在买进卖出中视买卖双方的身份而权衡使用。

1949年，人民政府取消了旧杂制秤，五百克为一斤的秤被广泛使用。1959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长葛县将十六两制市秤统一改制为十两制市秤。这时，各种内刀秤已很少见，常用秤多为外刀、毫纽结合式。1976年10月，全县木杆秤又改制为三刀式，并采用了定量秤。1985年，由于长葛是木村秤之乡，率先推行法定计量单位，从8月15日到12月25日，全县杆秤完成了向法定计量单位的过渡。

长葛除能修制种类繁多的木杆秤外，还能修制精密戥秤。戥秤是一种微型杆秤，由宋朝吴承圭发明。1940年前，已能制造贩卖“海洛因”“鸦片”用的微型戥秤。1949年以前长葛制造的戥秤，多为毫纽式，相当精确。戥秤量值曾几次改动。

其用量不大，只在药房、银号、首饰楼使用。长葛制造的戥秤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多用铜铤、铜盘、楠木杆或驼骨杆。1977年，根据国务院的《命令》，将戥秤改为千克制戥秤，采用三刀式，做工精细，灵敏度高，量值准确，款式新颖，使用方便。

二、长葛刷绒

长葛毛纺织业起始于长葛绒，何时开始生产，有两种传说：一为宋代，长葛王某，于西北某地学得织绒技艺，回长葛后办起了刷绒作坊，所织刷绒轻软洁白，深受群众欢迎，后作为贡品传入开封。宋王朝为了满足宫廷需要，便命王某到开封收徒传艺，扩大生产，开封遂有刷绒街。二为清代康熙年间，长葛有户孤儿寡母的贫苦人家，母子靠织卖土布为生。其子崔俊明，极其孝顺，且勤劳忠厚，聪颖过人。一年冬天，崔母不禁风寒，卧病在床，对俊明说：“啥时候娘能穿上羊羔皮袄就心满意足了！”俊明发誓要让母亲如愿，但一年辛苦依然买不起一件羊羔皮袄。于是就试用羊毛纺纱织布，然后用棕刷起毛，终于制成酷似羔羊毛皮的长葛绒。崔俊明还将技艺传授邻里乡亲，因此，后来的刷绒作坊，都写有“崔俊明府君”的神主牌位，作为长葛绒的创始者而四时祭祀。

创办较早且较著名的刷绒作坊为“泰兴合”。泰兴合始于清代乾隆年间，为孙庄村（今属增福庙乡）孙殿英（一说为孙泰兴）在村内兴办。传说当时孙家有田地数百亩，人旺财富，除从事农耕外，兼营油坊、粉坊、豆腐坊、刷绒、杂货、钱庄等业。禹县、周口、汉口皆有其店铺，总字号“孙泰兴”，所营各业均以“泰兴×”为分号，如钱庄泰兴恒，刷绒作坊泰兴合等。孙殿英下世后，孙家日趋败落，至民国元年（1912），泰兴合停业破产。

民国3年（1914）3月，陈鸿畴、张星蔚、田余三等人倡办“长丰工艺厂”，聘冀长生、席兆丰为经理，原泰兴合技师张居宽为技师，以被控免职的县知事何毓琪的赃款3000元（银洋）为官股，加上部分私股为资金，生产长葛绒。后张居宽自立门店，长丰厂日渐萧条，1948年改行榨油，1949年底，将私股退还本人，将官上交县人民政府，长丰工艺厂解体。



长葛刷绒

民国4年张居宽退出长丰工艺厂，

民国 10 年建立和盛兴刷绒厂，因经营有方又懂技术，工厂日渐兴旺，民国 29 年有织机 10 部，工人 90 人，日产长葛绒 120 米，遂成巨富。1947 年 12 月长葛县城第一次解放时，张家逃匿，工厂随之倒闭。

民国初年，县城富商看到“长丰”“和盛兴”生产刷绒有利可图，纷纷兴办刷绒厂，当时，县城内外大小刷绒厂（作坊）37 家，织机 50 部，职工约千人。以后由于日本侵略，交通阻塞、货币贬值、苛捐杂税等，刷绒业渐不景气，民国 33 年仅余和盛兴、长丰、义记、中华、怡和等 5 家。1948 年仅剩长丰一家，还停止了刷绒生产。

长葛绒，又名刷绒、织绒、珍珠绒。采用优质羊毛，经多道工序精制而成，其外形酷似绵羊羔皮，以轻、软、暖、不蛀、不臭、通气性好而倍受用户欢迎。宣统二年在清政府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泰兴合生产的长葛绒获超等奖。民国 4 年在旧金山举办的万国商品赛会上，长丰工艺厂生产的长葛绒参赛，获得银盾奖。旧志载：刷绒“销行口外，旗俗有服制者多衣之。”“畅销于京沪各埠，作西衣大氅者多用之，日本亦尝来函定购。”当时，长葛绒以其独具的特色，优异的质量蜚声国内外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及社会各界极其关心长葛绒生产的恢复。1950 年，省会开封举办河南省物资交流大会，河南省副主席牛佩琮点名要长葛绒参加省物资交流大会。1954 年，国家外贸机构也要求尽快恢复长葛绒生产。1955 年，县手工业管理局指令长葛县棉织加工厂试制长葛绒。1956 年长葛绒正式投产。1957 年，纺织工业部在天津召开全国第一次毛纺工业会议，长葛绒作为河南省唯一的毛纺产品参加展出，被评为优秀产品；同年，长葛绒在广州交易会试销。1958 年，县毛纺织厂成立，当年生产长葛绒 6.1 万米，并开始对苏联出口。长葛毛纺织厂，于 1961 年购置梳毛机、纺毛机各 1 台，依靠群众，革新技术，逐步改原始、落后的手工操作为机械化生产，同时新增加 9 个花色，研制出增强染色牢长昌共度和或花定型新工艺。1978 年，又将长葛绒加工技术，糅合到毛毯生产工艺中，生产出具有长葛绒风格的珠绒毯，在广交会上，受到外商赞誉。1978 年以前，长葛县仅有长葛毛纺织厂和长葛县老城刷绒厂两家毛纺企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陆续建成长葛县毛纺绒厂、长葛县毛纺制品厂、长葛县地毯厂、长葛县绒毯厂、长葛县第二毛纺厂、长葛县绒厂、长葛县第三毛纺厂、长葛县毛纺试验厂等毛纺企业、形成分拣、漂洗、梳纺、机织、染整等各个环节配套的毛纺企业群，成为全国较大的毛纺基地县之一。

1985 年，全县毛纺织企业，有职工 4496 人，固定资产 2513 万元，粗纺纱锭 7860 枚，年产呢绒 106.4 万米，毛毯 17.59 万条，长葛绒和驼绒 77.63 万米。完成

产值 3913.5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5.9%，上缴税金 697.8 万元，占全县工业税收的 55.5%，实现利润 252.7 万元，占全县工业利润的 30.1%。所产珠绒毯、人造毛毯、毛腈提花毯、仿驼绒毯、全毛水纹提花毯、混纺海军呢、混纺麦尔登、毛腈法兰绒、黑灰大衣呢等 9 种产品，先后 25 次获得省纺织工业厅以上优秀产品奖或优质产品奖。

三、长葛黄蜡

长葛黄蜡（亦叫蜂蜡、蜜蜡），驰名已久，早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就已行销黄河南北各省。河北及京津等地客商，经常来长葛收购，或委托本地人常年代收，直至民国初年，尚有河北省保定人刘春江来长葛，住在大周镇和尚杨村杨甫忠家收购黄蜡。

长葛黄蜡还是“贡品”。大周镇和尚杨村村民杨三波的祖上，就曾获清朝赏赐“素金铜顶戴”，以彰其所贡黄蜡。民国 2 年（1913）逊清太医院御医石国庆，尤致书本县曾在清朝度支部任职的京官张蔚蓝说：“长葛蜜蜡，真佳品也。”

黄蜡，系蜜蜂腹部轮节状处之分泌物，触空气后凝结而成，用以制造蜂巢和蜜槽。在取蜜后所残留的蜂巢，经过加工而成黄蜡。此为对中国蜜蜂（亦称“中蜂”或“土蜂”），原有之取蜡方法。

自意大利和英、美等国蜜蜂传入中国，对于养殖、采蜜、取蜡等方法均有所改进。由土筑蜂窝改作箱装由蜜蜂自行筑巢，改为人造巢础；取蜜与取蜡亦均改为半机械化。这对繁殖，运输赶花期、取蜜、取蜡，均迈出了一大步。而且制造“巢础”，成为长葛农村中的一大家庭副业，经常在外搞推销、采购等工作人员，达数百人，足迹遍及全国。

长葛养殖意大利蜜蜂（俗称“意蜂”或“洋蜜蜂”）约在民国 20 年前后。先是由李迈五在县城内（今老城镇）南城墙里家中养有数箱，后经推广发展，普及全县，养蜂采蜜取蜡，已蔚然成风。

黄蜡含虫蜡酸、脂酸、虫蜡脂等。性微温无毒，味微甘淡泊，为医药上常用之赋形药，外用治跌打损伤作被获色摄剂，内服治出血性下痢，并有防腐灭菌之功能。



长葛黄蜡

民国初年，一斤黄蜡可卖一至二串文。民国 22 年前后，一斤黄蜡可换 15 斤小麦，长葛县北部上等耕地卖四十五元至五十元一亩，四十斤至四十五斤黄蜡，即可换一亩地。民国 28 年长葛黄蜡卖 1.4 元一斤，1949 年卖 4 元至 4.5 元一斤，1959 年卖 15 元一斤，1967 年降至 4 元一斤，1987 年又降到 2.5 元至 3.5 元一斤，由于养蜂者增多，蜂蜜与蜂蜡产量增加，供过于求，黄蜡价格下降，在群众中产生了“卖蜡难”的问题。

大周镇和尚杨村，是加工黄蜡的中心，因蜡价下降，周围村庄的许多养蜂户，都为售蜡上愁。长葛县政协委员杨付生，为急群众所急，1985 年办起了黄蜡加工厂，并四处奔走，数赴京广沪闽，终与厦门港一进出口公司签订合同，使长葛黄蜡打入了国际市场，解决了群众“卖蜡难”的问题，并由此使许多人走上了致富之路。在杨付生的带动与影响下，和尚杨村许多农户都从事黄蜡加工业。

四、长葛麻绳

麻绳，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尤其过去机器设备缺乏，无论打井榨油修房盖屋牲畜套索等等，都少不了用绳。

新中国成立前长葛的杂货店，几乎家家都经营麻绳，每逢古庙集会，特别在麦收时，会上更有大批的卖绳摊点，据不完全统计，仅县城一带就有近百家纺绳作坊，而其中以老城王庄王森的麻绳最为有名。王森的麻绳，不但畅销县内，而且洧川、新郑、禹县、许昌、鄢陵等县打井或油坊的人，也常买王森的绳。许昌丈地街原有五家油坊，其中四家都是买王森的绳作油绳。

王森的麻绳能驰名畅销，是因其质量高价格合理买卖讲信用，绳用到底不起毛不断股，所以许多打井的人，都是预先订购，到时取用。

王森从小就跟他爹王保国学纺绳，在长期实践中，他摸索出一套经验。

1. 质量第一，麻绳是按斤计价，一般都怕赔秤称亏本，多将麻根麻皮糟麻纺入绳内，这自然要影响质量，而王森纺麻，则是先拣干净，然后再纺。

2. 纺经认真，纺经子除了用力均匀，一般上缙较紧，这样合出绳来就发硬容易断股，而王森纺经子上缙较松，合绳时容易拉均匀，合出绳来柔软不易断股。

3. 纺麻忌乱，麻一乱，就要“握鼻”“盘圈”，纺出麻经就很难匀实。王森总结出的经验是：“好麻抽尖，青麻抽边”，这样就不至于抽乱麻捆。

4. 盘个看天，因纺麻前要喷水，（一般好麻一斤喷一两半水，青麻加倍），纺后要晒干，所以在盘个时，要注意天阴天晴，阴天盘松透孔易干，晴天可盘紧点，这

就可以避免发霉影响质量。

5. 合绳看“刮”。“刮子”是块木头刻三道沟，隔开三股经子，合绳初，绳的一边绞慢，经的一边绞快，合至中间，两边快慢一样，合过中间，则换成经的一边绞慢，绳的一边绞快，这将经子上的麻毛就绞入绳内，合出的绳就光滑，用起来不起毛，所以合绳时，对“刮子”的移动，要特别留心，看“刮子”来指挥两边绞快或绞慢。

6. 购料认真，俗话说：“好料出好货”。没有好原料，就难出好货物。长葛多产青麻，而好麻线麻很少。王森每年向安徽及豫南商城、固始一带采购好麻线麻。

7. 订购先问用途。预订购绳，多是打井用绳，这就要先问是用包捞泥还是用桶捞泥？以免因绳子用途不同给顾客造成困扰。

8. 恪守信用不搞一锤交易，这是王森的经营之道，他的绳从来都是保证质量。因此声誉很高。

五、长葛圪塔庙的斧铤

长葛老城圪塔庙村生产“铁货”与“钢货”两种：铁货为钹、爪、铲、钯、钉等；钢货为斧、铤、锉、凿、刨、锄、镢头等。过去还有句俗语：木匠除墨斗，工具不用愁，去到圪塔庙，就有一整套。

圪塔庙的钢货，以斧头为最佳，刃利型美，眼正面光，质优价廉，早在清朝就已经畅销省内外。80年代还闹过一个笑话，有人从上海买了一把斧头，锋利无比，非常满意。但带回长葛后一鉴别，原来是圪塔庙打造的。

斧头分“明钢”和“夹钢”两种类型。明钢是一边平面，一边起棱，木匠多用此类型。夹钢是两边起棱，两边都可研磨，此型比较普遍。

圪塔庙的斧头之所以驰名，这与他们选料精细，打造认真有关。打造斧头要经过四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其窍门和秘诀。

第一道工序是选料下炉。一把斧须下2.1~2.2市斤的料，一盘炉，一次可下四把斧头的料，即八斤四两至八斤八两。第一道工序主要是火候，烧不透打不成，烧过了会打酥。一次烧不成再烧，又会减损斧头的质量和重量。所以火候是全部工艺的第一关。

第二道工序是夹钢、圆顶、捣眼（安装斧把的眼）。夹钢冲缝，必须深浅适度，偏正得当；圆顶应平整均匀，捣眼须不偏不斜。

第三道工序是锻打定型，面平无痕。

第四道工序是研磨抛光，验质包装。

一把斧头标准重量是一斤七两。

圪瘩庙斧头之所以好，另一个关键是炉上用煤。

打铁用的是烟煤，烟煤质量也有好坏之分，好烟煤渣少灰微热量大，打出的钢货，面平无痕，质地坚实，否则则反。所以他们多跑至宝丰县选购烟煤。

圪瘩庙打铁业始于何时，已无法考证。据该村七十多岁的老人王文学及其姐王嫩妮回忆，在孩童时听其祖父王运兴讲：他们打铁造斧就已经有好几辈了。还讲到其曾祖父与人打架，曾祖母掂着剪钢剪就冲了出去。这说明他们在五、六代以前，圪瘩庙就已经有了打铁造斧的手工造坊，而且家庭妇女已参加进去了。

王文学的祖父王运兴兄弟三人，王运兴生子福太、合太二人，合太生子文庆、文学二人，文学又生子留治、德乾、德治、德安、金安五人。祖孙叔侄皆打铁造斧，仅王运兴一支，就由一盘炉发展为十余盘炉。

王文学老人说，他记事时，圪瘩庙仅王姓和薛姓打铁。后薛姓薛成迁往驻马店，现在驻马店汝南一带打铁造斧的，多出其门下。

圪瘩庙杨思敬曾去驻马店跟薛成学艺，回来后立炉传子授徒，杨姓也成为打铁专业户。由于锻造成风，圪瘩庙周围的戴庄、口王、米庄等村庄还出现了许多铜匠和铁货专业户。

打铁，在过去长葛也有一些行业规矩。打铁敬“老君”为神，农历二月十五日为老君生日，要烧香上供叩头祭祀，每年开炉生火，也要烧香放炮敬奉老君。

从事打铁行业的人，如果出乡在外或贫困须要求助告贷时，将身带的小包袱挂在打铁砧子的“独脚”上，这就表明是同行，便可得到帮助。如果对方不愿帮助，用“探杆”（即火勾）将小包袱挑置一旁就行了。探杆，被认为是老君的“如意勾”，用探杆挑掉小包袱，表示是“老君之意”，挂包者便不能再说什么。如果用手拿下，说明你不是同行，而“任意立炉”，要惹出许多麻烦。

当时一盘炉要4个人，一个人煽火熔料，一个掌钳，两人轮换打锤、打杂。在正常情况下，一天劳动10~12小时，能生产40把半成品斧头。研磨抛光和检验包装，另须人工和时间。

六、长葛丝织

长葛丝织是传统手工业，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历代被统治阶级重视和享用，勤劳聪慧的手工丝织工人，为造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种桑、养蚕及丝织历史：我国在世界上是最早养蚕、缫丝和织造丝绸的国家，自

古以来就有“丝绸之国”的美称。长葛地处中原，历史悠久，交通方便，历来为南北物产交流必经之地。南丝北毛的发展和作为商品交流，很快影响到地处中原的长葛，于是长葛种桑、养蚕、缫丝和纺织随着我国丝织业的发展应运而生。它比长葛拳头产品——刷绒的产生历史要早上千年。明清时期，我国丝织业已发展到鼎盛时期，丝织业中已经有了固定的雇佣关系。据《许州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长葛县秋地一千二百二十四顷九十一亩九分六厘九毫，桑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二株，丝棉二十七千五两。明永乐十年（1412）秋地二千一百七十八顷六十一亩四分四厘八毫，桑五十四万五百八十株。清嘉庆十九年丝三千三百三两三二分六厘二毫五丝。《长葛县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知县潘守廉倡捐，会同本邑绅董共议集资一万三千余金，创修许长蚕桑中学，……并立蚕桑会社，集股创办于陈尧村，买地五十余亩，植桑万余株。又由邑绅王铭阁捐东关桑园一区，计地五亩”。

20世纪40年代，全县有丝坊10多家，织机20余张，从业工人200多名。大者一家3张织机，40人左右，小者一家一张织机，10人左右。

首帕系包头之用，每三尺为一条，售值小麦二十五斤，日产十六条，合小麦四百斤，利润最高。老师每年八百斤小麦，管吃饭住宿。纺织机坊较有名气的有“恒茂”，经理王继光，林记“林茂昌”，经理牛合林。王继光，1887年生，自幼在一家姓王的机坊学徒，后自办机坊，三张织机。产品有提花汴绸、绫子、八丝绸、提花被面、小花春绒。销路很广，洛阳南大街有一个绸缎庄包销。1946年又创出了一个新产品——丝毛呢，很受客户的欢迎。牛合林，1908年生，其祖上为山西高平县北关人，明末迁来长葛，开始织带子和制作扎线，产品行销河北、陕西、山西等地及禹、密、新、洧各县。

第八章 医药民俗

第一节 医药沿革

民国时期及其以前，长葛卫生医药事业发展极为缓慢。道光十九年（1839），县内仅有中医药铺7家。民国19年（1930）8月，西北军军医王孟杰回乡，在石固开办“广仁医院”，长葛始有西医。民国21年，佛耳岗村人薛敬奚，从陆军军医学

校毕业返里，创建长葛县立医院，职工 5 人，后增至 14 人。之后，朱寿亭、黄亚民、朱益民、赵戊五、赵子和、赵丙午、逯子震等在县城，李伍在石象，朱登仁、徐玉品在南席先后开办私人诊所。1947 年，县立医院停业。除县城、石固、南席、石象有几家私人西医诊所外，全县各集镇和较大村庄中有中医药铺 152 处，中医 203 人。人民群众由于缺医少药，生活贫困，健康毫无保障。每遇疫病流行，便有许多人被病魔夺去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医疗卫生工作。1949 年全县设西医诊所 37 个，医生 55 人。1951 年 9 月 6 日，长葛县卫生院建成开业，同年开业中医发展到 182 家。1952 年后河、石象建立卫生所。同时建立西医联合诊所 11 个，中西医结合诊所 22 个，1953 年建立增福庙区卫生所，1954 年建立和尚桥、石固、大墙周区卫生所。1955 年中医增加到 407 人，1956 年西医增加到 310 人，和尚桥、石固、后河、古桥 4 个区卫生所扩大为卫生院，县卫生院改为长葛县医院。

1985 年底，有县级医院 5 所、乡镇卫生院 12 所，村级卫生室 299 个，厂矿医疗保健室 34 个，床位 889 张，医务人员 1850 人。其中乡镇以上医疗机构有西医技术人员 702 人（主治医、药师 9，医、药师 83，医药技护士 286，护理员等 324），中医技术人员 122 人（主治医、药师 3，中医、药师 32，中医、药士 65，工勤 22）。形成县、乡、村三级医疗保健网，基本做到小伤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1986 年，除县医院不断扩大外，又建立了县中医院，12 个乡镇全部建有卫生院。2000 年后，又相继建立私立医院鸿基医院、新华医院、华健医院、仁爱医院等，长葛市的卫生医疗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二节 医疗机构

一、中医

民国 19 年（1930）以前长葛完全以中医中药防病治病，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及其以前，中医多系祖传世医或儒林学士改行习医。他们或以针灸医技，或以处方售药治病救人。其经营方式，有的设店坐堂、有的摆摊串乡。名医多坐堂应诊，病家登门求医。一般医生同时兼营药店，立方售药，不设病房病床。诊疗费用向无一定之规，以医师名望、病人病情及其家庭贫富而不同，故旧有“黄金有价药无价”之说。

清代长葛县中医较有名望者有李守先、武长岭、张会午、时光斗、胡建之、李万轴等。李守先精于针灸，兼通内经，著有《针灸易学》《针灸述古》。李万轴著有《奇经灵龟飞腾八法》。之后，县城主善局诊所杨子清、南席同义堂宋铁军、董村三和堂王景武、董村柳庄槐阴堂王玉凤、古桥天玉堂陈卿、县城（今老城）李恩锡、后河赵振，声誉较著。

民国时期，县境内中医药铺增加，有中医中药人员 60 余名。较著名者有：董村镇三和堂王欠成，世家出身，长于内科杂症，对妇科、针灸亦有研究，著有医案、医论数十卷（现无存）；李河口瑞兴堂李银升，精于内科、儿科、眼科，其余李云瑞，尤长眼科，著有《眼科问答》；仝庄中医朱恪勤，擅长内、外、妇、儿科，民国 30 年 8 月经省府考试获得中医证书；后河镇烧盆宋村黄耀武，医治伤寒，有独到之处，曾收门徒多人。

1949 年夏，进行中医普查和甄试，参加甄试中医 94 人。1951 年开业中医 182 人。1952 年，办中医联合诊所 4 个，中西医结合诊所 22 个。1953 年，长葛县卫生院设中医科，建立“长葛县中医学会”。1954 年，全县中医增加到 309 人，其中国家医疗卫生单位 29 人，联合诊所 214 人，私人开业 66 人。

1955 年 3 月，召开中医代表会议，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强调加强中医工作，号召西医兼学中医。1956 年，吸收中医 28 名和正骨名医 1 名，参加国家医疗卫生单位工作。1958 年，收集筛选中医秘验方 363 个，编印成册。1962 年，为实施河南省卫生厅《关于抢救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的意见》，给 9 名在妇科、针灸科、喉科、眼科等方面有专长的老中医，安排了继承人，跟师学徒。1963 年，县人民医院中医治疗小儿下肢麻痹 39 例，治愈 21 例；治疗高血压 28 例，治愈 24 例；治疗糖尿病 18 例，治愈 6 例。古桥卫生院老中医刘子茂，治疗黄疸肝炎 175 例，治愈 168 例，治愈率 96%。1969 年县人民医院设针灸科，1972 年增设推拿科，主要治疗坐骨神经痛、风湿病、骨质增生等，疗效显著。1973 年，从农村吸收优秀中医 20 名，充实到各公社卫生院。1978 年秋，河南省统招中医考试，合格录用 4 人，分配医疗单位担任医师。1980 年，经省卫生厅考试，晋升主治中医师 3 名。1985 年，全县乡镇以上国家医疗卫生单位，有中医 122 人，中医病床 40 张，中医内科 15 个、骨科 3 个、眼科 2 个及针灸、推拿、烧伤、痔瘘等科共 24 个。

经过不断研究、发展，长葛中医药不但能治疗一般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对危重病、急性病、疑难病的诊治，都取得一定成就。如肝腹水、再生障碍性贫血、卒风后遗症、乙型脑炎、脑膜炎、阑尾炎等病，在临床诊治上均取得了满意疗效。

增福庙乡卫生院眼科医师张广离，三代祖传世医。其祖父张瑞星是清末颇有名望的眼科医生，其父张国定继承父业。张广离继承和发展了家传眼科的独特医术，用祖传秘方清凉散、拔云散、珍珠散、光明散等，配合针灸、中药治疗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炎、胬肉攀睛、沙眼等眼病，疗效显著，省内外慕名求医者甚多。

坡胡乡卫生院烧伤科医师张景奎，创建长葛县中医烧伤科。1976年他用祖传秘方配置成“二石槐香乳膏”，创出重三度烧伤不植皮治愈的奇迹。1985年调到城关镇卫生院，治疗烧伤的声誉更高，先后治疗水、火、气、电、化学物品等1~3度烧伤、烫伤2000余例，均获得满意疗效。1980年《内参》和《河南日报》报道了张景奎医师治疗烧伤的经验，省内外慕名求医药者络绎不绝。广州第六中药厂以专利分红为条件，要求生产“二石槐香药膏”。他复信讲：我不要专利，要济世救人。县科委拨给他研究经费300元和一架照相机，鼓励他继续开展治疗烧伤的研究工作。

原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院的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士俊（长葛人），长与中医内科杂病，1960年陈毅副总理外访归来经乌鲁木齐，患肠胃病，西医屡治不愈，后服士俊四剂中药痊愈，受到陈毅副总理的接见和款待。

二、西医

民国19年长葛始有西医。民国29年石象私人诊所李伍为一例肠管外流患者做缝合手术成功，是为长葛第一例外科手术。

1949年全县共有西医诊所37个，计和尚桥1个、石固3个、坡胡3个、增福庙6个、官亭3个、县城（今老城）10个、董村4个、石象3个、南席4个，西医55人。1956年全县西医增加到310人。1963年7月，县医院开始作上腹部、胸部、甲状腺、颈静脉、乳腺癌、断手再植等手术。1968年各公社卫生院先后建立手术室。1974年县医院作脾脏修补手术，1975年董村公社卫生院作剖宫产手术，1976年作植皮手术，1978年县医院作食管加肺叶部分切除手术成功。1984年7月，和尚桥太平村姚中昌患心肌梗死引起心脏骤停4分钟，经县医院4个科室14名医务人员共同奋力抢救恢复了心跳。1985年底，全县乡镇以上医疗卫生机构17个，有西医技术人员720人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传染病及功能检验科等126个科室，1986年以后开辟了高科技的医疗科室，如骨科、骨微外科等。

长葛籍在外地工作的西医人员，许多学有专长，造诣精深。老城镇前白村人高葆谦，民国32年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同年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深造。回国后任南

宁军医学校主任教官、国防部医务所少将军医主任。1950年，葆谦参加郑州市第二、第一医院小儿科的创建和领导工作，1960年任郑州市儿童医院院长，为小儿科疾病医治与研究作出很大贡献。

坡胡镇小李庄村人陈昕，1951年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曾任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外科副主任医师。长于泌尿外科。1955年作肾、膀胱、脾、胃切除手术，1980年主持用人工肾机抢救肾功能衰竭病人首例成功。又为三名肾动脉狭窄（肾性高压）患者施行自体肾移植成功。1981年6月独自为一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晚期移植异体肾成功，成为省内著名泌尿系统外科专家。

董村人邓爱民，1956年河南医学院毕业，长于骨科。1973年治疗肱骨上端巨细胞瘤时，用根治术成功地保留了上肢功能。著有《血源性基准化脓性骨髓炎140例临床分析》《中西医结合治疗骨关节结核》《骨脓肿44例临床分析》《良性软骨母细胞瘤》等。

大周镇五道口村人皇甫永穆，1958年武汉医学院毕业，调同济医科大学实验研究中心从事生物化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其学术论文有“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及其防治”“马王堆西汉女尸和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男尸组织DNA、RNA和脂质、维生素含量的分析”“合成食用油生物试验的研究”“胎儿质量预测——羊水胆碱酯酶、同二酶均一个梯度凝胶圆盘电泳在产前诊断畸形胎上的应用”等。后三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卫生部科学奖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二等科学奖。

三、中西医结合

1956年，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收效显著，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基础理论。西医抢救危重病人，每每奏效，于是组织中医学习知识和疗法。1958年，全县医疗单位建立西医学习中医小组61个，145名西医医师（士）、133名护理员（占西医人数95%）学会用针灸治疗肚痛、牙痛等常见病。是年，县医院经中西医会诊，用针灸、大黄酒皮汤治愈阑尾炎3例。1959年，县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350例，其中烧伤面积达84.6%的患者一例。

1974年，长葛县卫生学校，开办乡村医生和在职西医学习班，增设中医基础课；开办中医学习班，增设西医基础课。1976年6月，县人民医院建立中西医结合领导小组，三个月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65例，其中肠梗阻19例、消化道穿孔4例、胆道患者7例、阑尾患者35例（中转手术治疗9例），治愈率85%，无一例死亡。此外，还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乙型脑炎、脑膜炎，用中药排石汤治疗胆、肾、

膀胱结石，均取得成效。

1978年开始，县人民医院以西医主治医师吴甲戌、中医主治医师段怀庆为主，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研究。以西医治标、中医治本，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的原则，共收治冠心病患者31例，其中中西医结合治疗21例，全部治愈或好转。在临床中观察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患者，病情稳定，康复迅速，远期疗效好，复发率低。而单纯西医治疗的10例，死亡1例，治愈9例，后有6例复发，其中4例一年中多次复发住院。

70年代，县人民医院选送优秀西医师6名，到中医学校进修，掌握中医诊断、治疗技术，同时组织中医学习西医西药知识，学会使用血压计、看检验单、X光片、超声波、心电图、脑电图、CT、B超等诊断技术。

第三节 常见病、地方病及其治疗

一、地方病

地甲病 1959年至1980年，四次普查普治，共查出患者475人，治愈50%以上。

大骨节病 1959年、1980年普查普治二次，查出患者150人，此病多系外来，经过治疗，大部痊愈。

克山病、克汀病 1980年进行普查普治，发现克山病5例，克汀病2例，均系外来，经治疗已痊愈或好转。

头癣 随查随治，1975年查出1083例，1980年查出1008例，1981年查出249例，1984年查出117例，经治疗90%以上痊愈。

氟中毒 1979年，在南席公社9个大队进行氟中毒和饮水含氟量调查，查出氟中毒7301人，发病率62.7%。1981年，对306所学校进行调查，查出氟中毒8652人，发病率为8.7%，接着对全县除老城、坡胡两公社以外的10个公社进行普查，共查出氟斑牙15528人，疑似氟骨症2人，发病率为37.29%。

二、传染病

霍乱 1952年开始接种霍乱疫苗，以后多年未发生疫情。

天花 新中国成立前不断流行，死亡率很高。民国30年，主善局始种牛痘。

1951年开始大量接种，控制了疫情，当年发病1例。1952年发病14例，全部治愈，以后绝迹。1982年停止接种。

白喉 疫情报告始于1951年，1954年开始注射白喉类毒素、百白破混合制剂，1970年后未再发生。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1951年~1985年共发生4686例，死亡386例。其中1976年发病3217例，死亡168例。1979年改注射脑多醣体A群菌苗，降低了发病率。1985年发生22例，无死亡。

百日咳 1951年至1985年，除1961年外均有发生，1975年后稳定下降。开始注射百日咳疫苗，后注射百白破混合制剂。

斑疹伤寒 1951年发病9例，全部治愈，以后无发生。

回归热 1951年至1957年有人发病，1958年后无病例发生。

猩红热 1952年至1984年，偶有发生，1985年未再发生。

伤寒、副伤寒 民国时期不断流行，死亡率很高。1951年开始注射伤寒疫苗，除1962年发病933例，死亡2例外，以后发病率逐年下降。1985年接种伤寒四联疫苗。

病毒性肝炎 1960年始报疫情，1978年发病2107例，经过疗养，大部痊愈。

流行性乙型脑炎 1953年始报疫情，1976年发病309例，死亡39例。1978年开始接种乙脑疫苗。

疟疾 民国时期疟疾不断流行。1951年始报疫情，1964年发病41549例，死亡1例。除采用奎宁、氯喹、伯氨喹林、乙胺嘧啶等药物治疗、休治、复治外，还大力采取治脏灭蚊等综合措施，1982年以后，基本控制了疟疾的发生。

黑热病 民国时期不断流行。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发生。1953年开始采用斯锑黑克针剂治疗，1954年后无死亡病例。1977年以来无病例发生。

1984年在石象村进行结核病调查，对15岁以上741人进行了胸透，占应透人数96.5%，确诊为肺结核18例。对15周岁以下1014人，作结核菌素试验，占应试验人数91.7%。其中阳性64人，阳性率占6.31%，同时，对阴性者全部接种了卡介苗。

三、常见病

长葛一带的常见病以感冒为主，一般病有肺病、肝病、肠胃病等，凡有此病者多到医院治疗，有利用中药治疗的，有汤剂和中成药，中医一般都是通过把脉、看

舌苔诊病，中草药回家自己熬制。这类病西医通过注射或口服西药治疗，唯有感冒被视为不重的常见病，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用偏方或土法治疗。如大人感冒喝谷子（带皮的米）发汗，小孩用葱擦脚心或胸口用被子再蒙住头发汗。成年人咳嗽用蛤蟆皮草煎鸡蛋，或用本地槐枝用油炸后捞出，用油炒鸡蛋，或用红糖炒芝麻治疗，小孩酌量减少。

成年人常有腰腿疼病，多服用黑豆治疗。

70年代以后，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人们有病不论大人、小孩都到医院治疗，也有靠民间偏方诊治的。如肝病用大红枣煮白蒿，或者其他偏方治疗，这多是家庭困难或者是在医院治疗不好的重病、怪病才用民间偏方治疗。

第四节 中药材

长葛土质、气候，适宜多种药材生长。人工种植和野生药材有薏米、牵牛、红花、红娘、白芷、南星、白附子、荆芥、薄荷、小茴、麦冬、苏叶、车前子、瞿麦、地黄、菊花、白豆、赤小豆、天花粉、牛蒡子、莱菔子、百合、桔梗、丹皮、白芍、二花、首乌、大艾、竹叶、香附子、益母草、虫蛻、芮仁、斑毛、秦艽、枸杞、杏仁、桃仁、枣仁、苍耳子、桑葚、地丁、木则、芡实、柏子、牙皂、白毛根、腊梅、梔子、丁香、仙人掌、鸡冠花、豆根、蜂蜜、黄腊、韭菜子、大蒜、马齿苋、葶苈子、扁蓄、茵陈、石榴皮、槐米、花米壳、猪牛羊胆汁、驴狗肾、水蛭等70种。县医药公司又引进川芎、白术、元胡等。1985年普查，全县有人工种植中药材135种，野生中药材48种。其中尤以白芷、南星、薏米、白豆最为出名。民国4年长葛薏米、白豆参加巴拿马万国商品赛会，受到外国药商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长葛的中药材生产，几经周折、终有很大发展。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由种植，到1953年对白芷、南星、白附子、薏米、苏叶、薄荷、白芥子等实行计划种植。1956年药材公司建立，加强中药材生产指导，1957年种植1332亩。1958年忽视多种经营，中药材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缺。1959年，投资4万元在增福庙公社簸箕杨大队办起中药培植场，种植白芷、南星、白附子、白芍、苏叶、薄荷、红花、菊花等400亩，收获药材3万余公斤。1962年实行奖售政策（每出售50公斤白芷，奖粮15公斤，化肥20公斤，布票3市尺），调高收购价格，药农得到实惠，1965年，全县药材种植面积猛增到2677亩，全年收购金额达88.4万元，仅白芷就收购577798公斤，除满足国内市场供应外，出口换汇7万元。1966年至1971

年中药材生产无人过问，奖售取消，价格降低，产量锐减。1972年，长葛医药公司恢复对药材生产的领导，并从四川、浙江请来川芎、白术栽培技术员各1人，使川芎、白术、元胡等急需药材，在长葛栽培成功。1978年后，药材生产有较快发展。1985年全县种植药材3843亩，其中白芷2500亩，收购22万公斤。但随着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些传统药材减少。水磨河一带的荆三棱，曾是名牌俏货，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常点名索购。后因湖中水位下降，已绝迹。董村牛脾山一带的地丁，李河口等村的牛子，石固梁庄一带的牙皂，每年均可收购数千斤，现已难以收到。全虫、蜈蚣、斑毛因大量使用农药，也已短缺。因药材收购价格不合理，挫伤药农积极性，如后河镇山孔、榆林一带山坡地多种小茄，每年可收数千斤，因收价太低，1975年以后，群众就不再种植了。1968年收购薄荷21万公斤，后降价每斤2角，收购量大为减少。野生药材苍耳子每斤5分，根本收不起来。

在长葛种植的主要中药材有以下几种。

长葛白芷 白芷为多年生草本伞形科植物，其根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称芳草，列为中品。《吴普本草》称苻蒿、泽芬。《别录》称白芷。《夷坚志》称香白芷。明朝万历五年，李时珍把白芷编入《本草纲目》。

白芷分为兴安白芷、杭白芷、川白芷三大类。长葛白芷属兴安白芷，但与川白芷有亲缘关系。由于长葛白芷产于县境西部小洪河两岸，所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质优效高，实属地道药材之冠，在国外享有崇高的声誉。1960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时期发生疾病流行，长葛的白芷曾大批运往越南医病防疫。

长葛白芷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始于16世纪20年代之前。清代及民国出版的《长葛县志》均有白芷记载。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药志》记述：“禹白芷主要产于长葛及禹县。”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药大辞典》记述：“白芷生产于河北者称祁白芷”，产于河南省称“会白芷”，亦叫“禹白芷”。

会白芷起源于明清。清代乾隆初年（1736）画匠王村药商乔金山引进试种成功，独家种植多年，到光绪末年（1908），该村种植面积已达七、八十亩，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白芷栽培区。当时长葛区划为十二保，画匠王村属于尚友保会河管辖，故称“会白芷”。此后，在小洪河两岸多有种植，逐步发展到长葛县的后河、坡胡、石固、增福庙及禹县的郭连、古城一带，形成了地跨两县的白芷种植区域。由于流通渠道的演变，“会白芷”等中药材大量集中到“小禹州”交流，天长日久，又习惯称“会白芷”为“禹白芷”。

民国26年（1937），画匠王村药商胡永清去安徽亳州买卖药材，碰到一老药商

说：“在中药界对白芷评论有几句顺口溜你知道吗？”遂念道：“香白芷、白芷香，白芷出在洪河两岸上，菊花心、气芬芳，药到病除一扫光。”此乃是对“会白芷”质优效高的赞誉。但是，新中国成立前“会白芷”生产发展十分缓慢，加之官商药霸的欺压和剥削，药农收益甚微。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白芷香，药农苦，一年到头忙碌碌，多了价低无人要，只好含泪喝糊涂（喝白芷汤）”的说法。所以，白芷种植面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发展到 100 多亩，总产量 25000 公斤左右。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关怀下，白芷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平均每年收购量为 115600 公斤，调出量为 112200 公斤。1960 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共产风”的影响，白芷生产也深受其害。

1965 年是长葛白芷生产形势最好的年份，收购量达到 579200 公斤，调出 57 万公斤，药农明显地增加了经济收入。1966 年“文革”开始后，又一次冲击了白芷生产，严重影响了药农的经济收入。1981 年至 1984 年间，市场紧缺，供不应求，价格猛涨，刺激了农民种白芷的积极性，加之市场开放、多渠道经营，致使种植面积失控，到 1985 年全境种植白芷达到 2000 亩，单产 250 ~ 500 公斤，总产量 80 万公斤，出现了生产过剩、价格猛跌、药贱伤农的局面，给国家和药农造成了一次较大的经济损失。当年，白芷因价格断崖式下降，被当地群众戏称为“黄金臭狗屎”，贵时如黄金，贱时如臭狗屎，无人问津。据村民加快，1981 ~ 1983 年，刚收获的白芷，未经加工、晾晒，每斤售价 8 元以上，到 1985 年，加工晾晒成干的白芷，每斤收购价只有 0.1 元。

长葛白芷的药用部分为其干燥根，形态类似圆锥形，无明显棱脊，个头整壮。质地坚实，呈黄白色，皮质细腻，粉足饱满，气味芳香浓郁，内呈菊花心花纹，是长葛白芷质量地道的独有特征。经江苏植物研究所鉴定，白芷含挥发油，根含呋喃香豆素：其中含比克白芷素百分之二；比克白芷醚百分之零点二；氧化前胡素、异欧前胡素、珊瑚菜素百分之零点零一五；还含有花椒毒素、紫花前胡昔元、脱水比克白芷东茛菪素及水合氧化前胡素等十多种有效化学成分。1987 年成都军区总医院和四川省计划生育研究所共同对白芷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新的研究，分离出十三种香豆素，其中六种是前人从未发现的新成分，证实白芷是含香豆素最多的一种植物，为进一步开发利用白芷提供了科学依据。

长葛白芷具有抗菌作用，据体外初试对大肠杆菌、痢疾杆菌、伤寒副伤寒杆菌、绿脓杆菌、霍乱杆菌等均有一定的抵制作用。药性辛温，入肺、脾、胃三经。作用祛风、除湿、消肿、止痛，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医治头痛、眉棱骨痛、

牙齿痛、寒湿腹痛、鼻渊、肠风痔漏、赤白带下、痈疽疮疡皮肤瘙痒、疥疮等。白芷配伍可入许多处方。实践证明，用白芷、苏叶两味药治疗感冒，实属良药验方。用白芷和乌贼、牡蛎配伍，治疗妇女带下有绝妙之效。白芷也是一种植物类优质香料，广为酿酒、卷烟、食品、化妆品等工业所用。

长葛白芷质优效高，蕴藏丰富，老城以西6个乡镇的116个村庄，都曾经是白芷生产基地；且种植历史长，自然条件适宜，具有传统习惯及种植技术，基础扎实。但因价格浮动太大，1985年后已很少种植，药贱伤农的教训十分深刻。

天南星 天南星，系多年生草本植物，天南星的球状块茎供药，原名“虎掌”，是长葛传统地道的名贵中药材，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是我国药材出口商品之一。

《本草纲目》中，对天南星作过详细评述。《长葛县志》（清朝版）对天南星也作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为保证人民用药安全有效，《中国药典》历年版对天南星的来源、学名、历效、鉴别、质量标准等均作过详细论述和规定。这不但说明此药应用之久，而且在诸药中享有一定的地位。

天南星主要产区分布在石固、坡胡、后河三个乡镇。1965~1968年种植面积均达到800亩，年收购量在12万公斤左右，长葛历史上最高收购量达13万多公斤，外贸出口2万公斤。1990年后，已很少有人种植。

白附子 白附子，是长葛的地道中药材之一，是天南星科独角莲的干燥地根。秋季采挖，除去须根及外皮，用硫磺熏一至二次，晒干成药。

本品呈椭圆形或卵圆形，长2~5cm，直径1~3cm，表面白色至黄白色，略粗糙，有环纹及须根痕，顶端有茎痕或芽痕。质坚硬，断面白色，粉性。无臭，味淡，麻辣，刺舌。泡制方法：取净白附子，分开大小个，浸泡，每日换水一至三次，数日后如起粘沫，换水后加白矾（每100kg白附子，用白矾2kg），泡一日后再进行换水，至口尝微有麻舌感为度。将白附子取出后，再用生姜片，白矾粉置锅内加适量水，煮沸后倒入白附子，共煮至无干心，捞出，除去生姜片，晾到六至七成干，切成厚片即可药用。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白附子味辛、性温有毒。归胃、肝经。有祛风痰，定惊、解毒、散结之功能。用于中风痰壅、口歪眼斜、语言涩謇、痰厥头痛、偏正头痛、喉痹咽痛、破伤风症、外治瘰疬痰核、毒蛇咬伤等症。

白附子主要产于长葛后河、和尚桥、老城和增福庙等乡镇。过去，因为白附子生产投工大、价格低、自由种植，所以收购量忽高忽低。但是，我县药农种植白附子历史悠久，栽培经验丰富，气候适宜，具有开发白附子生产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第五节 药品经营

民国时期及其以往，药品由私人行店经营。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南席天宝堂中药店开业，经销业务甚大。新中国成立前夕，长葛共有中药店（铺）152家，多集中在老城、南席、石固、后河、会河、和尚桥等集镇上。此外还有许多游乡串村的药贩，他们除经营中药材外，还经营部分成药。如县城东街“益合成”药店，民国36年开始经营大圣丹、宝塔糖、何济公止痛散、唐拾义疟疾丸、万金油、哮喘丸和针剂盘尼西林、樟脑、六零六、片剂早发大安、磺胺、次苍、苏打片，以及体温计、注射针管、镊子、止血钳、手术剪等器械。1954年4月，益合成等药店联营组成“先进药店”，经营西药300余种，月营业额9000元。1956年10月转入供销合作社。同时，县城张玉、刘玉环等12人，联合成立公私合营药店、门市部2个，经营中西药品700种。南席、石固等集镇的中西医药人员，也都组成联合诊所或参加供销社经营。1953年12月，成立长葛县供销社医药经理部，1956年建立长葛县中药材公司，职工26人，下设石固、后河、和尚桥、县城、南席、洧川、韩佐等七个基层批发零售部。1980年4月建立长葛县医药管理局，1984年5月，恢复长葛县医药公司。至1985年底，有职工143人，其中干部26人，正式工87人，合同工30人。

1961年经营中西药品1419种，年销售额116.8万元，1985年经营中西药品、器械2014种，其中：中药材554种，中成药326种，西药850种，器械284种。年购进额349.1万元，其中收购药材29.3万元，中成药50.3万元，西药253.7万元，器械15.8万元。年销售额393.4万元，其中：中成药材42.7万元，中成药54.8万元，西药277.5万元，器械18.4万元。

第六节 巫医巫药

长葛一带的巫医在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盛行，有神汉（下马子）神婆（下神）两种，神汉为多。1957年以后逐步减少，大都是在暗中活动。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或是现在，大都是有些病到医院请医生看后，吃药打针不见轻，被认为是“邪病”，即找巫医求治。另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急病，病因不清楚，病状特殊，认为是怪病，也找巫医求治。还有的是小孩突然大哭不止，或者昏睡不醒，再有的是病发急症状奇怪，以为是“鬼说了”，或者是亡故后

的亲人来看孩子，使小孩生病，也要找巫医，驱鬼治病。

巫医本人敬的都有神，所敬的神都是在当地“显灵”，被人公认为“有法力”，能“消灾降福于民”的神，如“刘爷”“王爷”“关爷”“刘奶奶”“王奶奶”等，至于此神何种来路，法力如何，求医的人不知道，敬奉此神的巫医也未必能说清楚。

巫医看病时，求治者先说病情，然后巫医请求治者点香燃纸，并祷告，其词为家人有病，请“刘爷”“王爷”诊治。然后神汉、神婆便抹脸，长吁一口气，即说道：“‘刘爷’或‘王爷’来了”，边在嘴中含咒，念咒念的什么词、什么内容，求治者是听不清听不懂的。念过咒后，即用黄表纸折成椎形尖筒，在燃烧的纸香前来回晃动，纸筒里蜇下的碎粉即为神药，用纸包起来，让病人用水喝下即服了神药。有的是巫医说某某树上有仙家，都让病人到这里求药，病人家属便会带领病人到树下磕头烧香，同样是用纸折筒求药。若病好，便会在树上挂旗挂彩绸。

也有巫医称，有病人是鬼魂附身所致，而且鬼魂就在家中，神汉要画符，贴在藏鬼的地方，尔后挥起桃木剑，或真剑、刀驱之，神婆则是烧纸念咒驱鬼除邪。驱鬼时要打开大门屋门，以便鬼逃跑。驱鬼后，主人要给巫医封礼金。

病危的人或者老年人病重时，家里人为了办后事有准备，都要找巫医看“惯口”，即人死的日期。巫医要家里人说明病或者老人的生辰八字，以及得病、病重的日期，就算定其某月某日死，一般说一个准确的时间，另外再说一个大的时间空间，比如说：“初三去世，如果初三不死，就会在某月或大致几天的时间里死。”在肯定日期的同时，也留有很大的余地。

巫医是封建迷信，近几年虽然巫医仍有活动，但随着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已很少有人再信巫医，有病都会到医院诊治。

第七节 民间卫生习惯

一、家庭打扫卫生

一般是早晨起床后，先要用竹捆的大扫帚（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用家种的扫帚苗长老后砍下捆起来当扫帚）打扫卫生，夏天先洒水，后扫地，垃圾都扫到院内挖的沤制农家肥的粪坑内。院子是由男人（一般为家内的男掌柜起床打扫卫生后招呼家人上工干活），女人起床后用小笤帚（秫秆穗捆绑成）打扫屋内卫生。每天如此。如果是院内堆放什么东西，地上有杂物，可以不分男女随时打扫。

另外，家里要来客人，或逢喜庆的日子，要由妇女先打扫卫生，室内、室外均打扫干净，并用抹布擦洗桌椅。如果客人来后，发现屋内屋外有脏物再打扫，被视为对客人不敬，即有撵客的意思。

一年到尾，腊月二十三以前是要打扫厨房，所有的墙壁、屋顶都要打扫干净。但是大年初一扫下的垃圾不许往外扔，意为聚财，须到初五以后才可清理。

二、洗澡洗衣

每天早晨起来要洗脸，女人不洗脸不许进厨房做饭，男人不洗脸不许吃饭。用洗脸盆打上水（冬热夏凉），洗脸后再用毛巾擦干。晚上一般都用水洗脚后再睡觉。夏天男人到坑塘、河里洗澡，女人则在家关门闭户用水擦身子，擦身子时，用洗脚盆盛水。有的是先把水倒进洗脸盆，洗脸后再倒进洗脚盆擦身子。如果村里没有水坑、河，男人也要在家里用水冲洗身子，即站在木盆里，用水瓢舀起水在头顶往下倒着冲，然后用毛巾擦干身子。1990年以后，生活条件有了大改善，家里夏天洗澡用太阳能，冬天都到专业澡堂洗澡。

长葛一带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洗衣服多用皂楠树结的皂角裹在湿衣服里用棒槌在捶布石上捶碎，然后浸泡在洗衣盆里洗衣服。也有用草木灰冲下的水碱澄清后用来洗衣服。家庭条件差的，就在清水里摆洗衣服。60年代以后用肥皂洗衣服，70年代以后开始用洗衣粉，如今虽仍用洗衣粉、肥皂洗衣服，但洗洁精、洗衣液已全面推广。新中国成立前后多用大瓦盆洗衣服，后用搪瓷盆，后用大铁盆、大铝盆，现在全部用洗衣机。

晒衣服时，女人的内衣不能挂在当院，小孩衣服和女人衣服要赶在天黑前收起，不能见星星。

三、饮食卫生

粮食要先拣而后磨，拣粮食时先用竹筛或小铁筛子筛去杂物，而后用手拨着粮食粒拣去沫草或石粒土块，拣好后小麦再用水淘，淘净晾干后再磨成面粉食用。

为保证粮食不被鼠吃，不落灰尘，多用粮屯囤起来。粮食屯早时有用秫秆皮编制的长条屯圈，也有用铁皮扣制的屯，屯底是用木板做的圆盘，周围钉的有木沿。到了70年代以后，人们用水泥预制大缸盛放粮食。80年代以后，用麻胶布袋装粮食，垛起来后再用塑料布裹起来。

盛用面粉时，为了保持卫生，新中国成立前后多用面坛（陶制），人口多的用

面缸（陶制上釉）存放，也有用木制的面斗柜存放，但以面坛、面缸为多。60年代起，多用各种废弃的盛装物品的圆桶存放面粉。

盛食品及食用的器具有锅、碗、瓢勺、筷子等，一般都是一顿饭一刷洗。每顿饭餐后，即用水刷洗锅、碗、筷，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会将刷洗过的碗筷再重新用热水冲洗一遍，以示对客人的尊敬。长葛一带新中国成立前后用陶制刷釉的碗盛饭，多为竹筷子。60年代以后用搪瓷铁碗，但仍以陶制刷釉的碗为主，80年代后有用塑料制的碗，也有用钧瓷碗，如今以搪瓷碗、塑料碗为主，竹筷子仍是主要用餐工具。这些器具除每顿饭刷洗一次外，逢年过节也会再冲洗一次。

四、灭鼠

老鼠是长葛一带危害人们身体健康，而且毁坏衣物、粮食的最大敌害。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于老鼠多的地方采取水灭的办法，其办法一是在水盆里盛上水，上边飘有食物，盆上边放一圆棍，当老鼠沿着圆木棍到盆里吃食物时，圆木棍滚动，老鼠掉在水里淹死。办法二是在大水缸里盛满水，水上撒满麦糠，缸中插一木棍，老鼠沿木棍下去采食时，跳在麦糠上落水。也有采取穴除的办法，即找着老鼠洞穴灌水，逼老鼠出洞打死。也有用砖土将鼠洞封死除之。但大多数农户是靠养猫除掉老鼠，有一猫管十家之说，即一只猫可以灭除十家的老鼠。

50年代以后开始用老鼠夹消灭老鼠为主，80年代长葛的老鼠药闻名全国，鼠药成了灭鼠的主要办法，但鼠药危害大，毒性强，常有人误食中毒。2003年国家对于毒鼠强进行了专项治理，长葛的鼠药生产厂家、销售窝点被依法打击，剧毒鼠药自此退出市场。在2003年的毒鼠强专项治理中，长葛共捣毁神猫化工有限公司、春阳化工厂、南席镇红星助剂厂等生产鼠药窝点3个、储存鼠药窝点2个，取缔无照经营鼠药摊点、窝点17个，查获剧毒鼠药1500多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鼠药全部被无害化处理。

目前，农村仍以养猫除鼠为主。

第八节 民间医术

长葛一带的民间医术有针灸、拔火罐、推拿等。

针灸即用针扎患病的穴位，以此治病。这种医术多为祖传，也有跟别人拜师学技的。

拔火罐，是用火罐或大口瓶，燃上纸，猛扣在患病的穴位，借火罐内的吸劲吸出病毒去病。

推拿，主要用于治跌打损伤骨病，农村俗称为“捏先”。即摔伤或骨头脱臼，用手狠劲推捏，使伤骨重新接好，或使脱臼骨头回位，这种医术多为民间祖传，一般治疗跌打损伤，大的骨病还要到医院治疗。

膏药，民间治疮、腰腿痛病多用膏药，膏药多为祖传药方熬制，种类很多，名字也千奇百怪，但大都是以膏药的主要用料，或个人姓氏命名，如赵庄膏药、狗皮膏药等。

第九节 民间医生

长葛一带民间医生称为先生，先生们多为祖传，子承父业，也有投师学技的。有名望技术高的先生，一般都在家设有药房诊疗室，在家看病。有人请，也到病人家里看病，俗称“请先生”。然后随先生回家取药，危重病人，先生带有药箱，随即针灸或打针开小药箱取药让病人服用，这类药多为自己配制的丸药。一些医术不高的人，称为“野先”，这类先生，背着药箱，或者是小包袱，带着自制的药，针灸用的针，走街串巷叫喊。这些人喊叫的或者打的招牌都是治疗“疑难杂症”，如有人看病，就在大街上摆开摊，卖药针灸。还有一种在街头上并不叫喊，而是在地下铺一块白布，布上写明卖什么药或治什么病。如果是治牙的用瓶子装上几颗牙放在布上做幌子，起痣祛斑的则在布上画有人头像，头像的脸上长痣长斑，卖蚰子膏药的则用秫秆签扎个蚰子摆在摊上做幌子。

农村中叫魂不请先生，都是家中老年人叫魂。如果是在外边掉了魂，年老的长辈拿一把竹篮子，拿一件丢魂人穿的上衣找吓掉魂的地方，然后竹篮子放到地下，把衣服放在篮子上，边叫边走着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一直叫着走回家里。另一种叫法是小孩吓掉了魂，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三个时辰，在吃饭前由家中老人拿把盛饭用的勺子，磕着屋门的门头，边磕边叫：“勺子磕门头叫，××回来了，××回来吧！”反复多次，磕着叫喊，直到孩子惊吓的症状消失恢复正常后方止。

以前农村的接生婆，多为本村的老女人，或中年妇女，他们不需要培训，生的孩子多，有经验即可。到后来也就是70年代以后，才逐步由农村赤脚医生取代，但仍然有接生婆活动。

第九章 游乐民俗

第一节 游乐沿革

长葛一带的游乐活动，大都属于民间休闲娱乐锻炼强身的松散性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在闲暇时，自发性开展一些活动，没有组织，没有比赛，没有奖惩，只为求趣求乐而已。如踢毽子、跳绳、打抬、刀抖等，这一类都是小型活动。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活动，比如打秋千、斗鸡、斗鹤鹑一类的活动，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只是由一些热心人出面召集组织，或自备一些道具吸引大家参加，从中取乐。比如斗鹤鹑召集人要备下大簸箩供斗鹤鹑用，搭秋千要备下粗麻绳、长木棍等，活动时有人出面排个先后顺序，有争端主持公道。

20世纪60年代，民间小型的游戏活动虽然仍属自发性，但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提高，人们的游乐已开始有人出面组织。在节日里，一些大队、学校及一些社会团体，会组织跳绳、踢毽子、打篮球、拔河、象棋等比赛，并且发奖评先，有物质有荣誉奖励。在这个时期，由于人们文化生活的缺乏，游乐活动比较兴盛，每到农闲节假日，或晚上，各类活动比较活跃。

70年代，由于受社会背景的影响，再加上生产的繁忙，游乐活动减少，而且带有一定政治色彩。有一些被视为“四旧”而被禁止，如“麻将”“骨牌”均被禁止。只保留一些学校内适合少儿活动的跳绳、弹弹子，同时也新兴起一些新的活动项目，如摔面包、砸钢碗等，成年人的活动集体组织的项目多了，除打篮球外，也兴起乒乓球、羽毛球，除象棋外，也新兴起军棋、跳棋，打扑克也新兴起“人民战争”等，田间地头的活动，除了“摆方”、下“皮条”外，也有了摔跤比赛，但都是自发零散的娱乐活动。

80年代起，城镇单位由工会出面组织活动，农村则由团支部、民兵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活动的时间大都在五一、春节，因十月一日正是农村种麦的紧张阶段，很难开展活动，妇女则在三八节开展跳绳、踢毽子比赛，但最多的比赛项目是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拔河、象棋、军棋、跳棋、打扑克等。

进入21世纪，衣食住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娱乐休闲的方式有了很

大的选择性，游乐活动空前活跃。除自由散乱性的活动外，如下棋、打扑克，以及单位、集体组织的比赛性的活动外，如拔河、球赛外，民间自发地兴起了一些新的游乐组织，比如钓鱼协会，他们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比赛活动，对于优胜者，发奖或物质奖励，奖鱼竿、鸟笼等，其资金来源均由民间自行筹措。政府也有文化部门负责民间游乐活动，使这些活动有章有度有序健康发展，避免赌钱、赌财物的违法现象发生。

第二节 游乐竞技种类及类型

游戏竞技的类型有成年人型、少儿型两大类，又分室内室外两种。

一、成年人型

成年人室内的游乐竞技的种类 有象棋、军棋、跳棋、麻将、骨牌、扑克等。象棋、军棋、跳棋都是全国统一的下法，骨牌在长葛一带仅有，即用竹批或木板，过去是用骨头刻成所以称骨牌，俗称揭鞞，多用竹批、木板、塑料等刻制成，版面上钻有圆眼，其名称有骡子（十二个眼）、花十（10个眼），眼的颜色有红、有黄，红十（10个圆眼的颜色即红6黑4）、墨十（10个圆眼全为黑色），另外还有人7、红8、黑8等，都是根据圆眼的颜色而说。四人揭牌数点，三人玩一牌。出牌的过程中，大点压小点，大对压小对，如果第一个起牌的人先发牌，牌好可以先发牌，牌不好叩牌。若先发牌不赢为抬头鞞，即一鞞。要是牌不好，会把牌翻着放下，谁的牌好谁揭，揭牌人如不赢为鞞，揭一次为一鞞，鞞要出鞞钱，四人都有。牌共24张，四个人数点，只有三个人干，数着谁干，但鞞钱当场四人均有一份。

打扑克，在长葛一带，过去是打百分，后来打人民战争，80年代打“五十K”，现在打“双升”“二七主”。后又兴起“斗地主”“挑红十”“推拖拉机”等，由原来的娱乐发展为赌博，被公安机关打击。

成年人户外活动 摆方。即在地上划五横五竖交织成正方形，在横竖交叉点摆子，两人用不同东西当子以便区分，大多就地取材，用小石头、干柴棒、树叶。一人先下子，另一人接着下，但规矩是先下后吃。游戏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摆，要想方设法获得奖励、多摆子，第二阶段为吃，要想方设法获得奖励、多吃掉对方的子，把对方的子全部吃完，游戏结束。游戏规则是摆成规定形状，可以奖励多下子或多吃子，规定形状有方、小斜、四斜、周、老通。方，即四子摆成方块，可多

摆一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一个子。小斜，即三子相连与两条边成斜三角，可多摆一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一个子。四斜，即四子相连与两条边成斜三角，可多摆两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两个子。周，分边周、二周、中周，必须五子连成一条线，五子相连在边的称为边周（第一阶段可多摆一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一个子），五子相连在第二条横线或竖线的称为二周（第一阶段可多摆两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两个子），五子相连在中间的横线或竖线称为中周（第一阶段可多摆三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三个子）。老通，即对角线五子相连，第一阶段可多摆三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三个子。第一阶段摆满后，进入第二阶段，先各掐掉对方一个子，第一阶段后下子者先走。摆方是一种益智游戏，多在田间劳动休息，或者街头休息时玩耍，是男人或男童间的游戏，需要走一步看三步，否则一步走错，对方获得大的奖励，就会满盘皆输。因此，观看的人不能说话，更不能提醒一方，否则就会坏了人家的好事。

类似的游戏还有摆皮条，即在地上划四横四竖交织成正方形，游戏规则与摆方大致相同，吃子的办法有扛篮、挑担、顶吃、甩鞭等。

二、儿童游乐活动

投清官 多由十岁左右的儿童活动，其场地多在土路上，由四个人进行，每人脱掉一只鞋子，用土封住鞋跟立起来，一排三个，两边的叫打手，中间的那只鞋叫死妮子，死妮子后边再立一只鞋叫清官，对面五尺左右划一道杠，四人先在立鞋的这头往横杠那头投鞋，依据离杠的远近排出先投后投的顺序，离横最近的为第一个投，依次排出一二三四，四人用另一只鞋投清官，两边的打手容易投，如果投清官撞倒了死妮子，那就得撅起屁股趴在地下，投中打手的问投中清官的人：“投着容易挨打难，问清官加垫不加垫？”清官如果和投中死妮子的人关系好，就说：“加垫。”一个打手就拿鞋垫在死妮子屁股上，由另一名打手打，边打边说。如果打手和死妮子关系好，就直接说道：“过银桥，走金桥，问问清官饶不饶？”如果清官和死妮子关系好，就说：“饶！”打手就不再打了，进行下一盘。如果清官说不饶，那还得接着打，接着过，直到清官说饶再停止。要是打手和死妮子关系不好，会边打边说：“过金桥，走银桥，河湾里有只咕咕喵，咕咕喵水里逃，跑到岸上看见猫……”只要押韵可以无休止的说下去，死妮子就得继续挨打。

星星过纓 星星过纓，也叫星星过腰，是多个儿童同时参与的游戏，男童女童都可参加，一般在晚上进行。游戏人员分三类，一人为“老师傅”，一人为“瞎

子”，剩余的人为过客。游戏开始前，一群人先通过查数、挥手等游戏选出一名“老师傅”和一名“瞎子”，一般是游戏第一名当师傅，最后一名当瞎子，也有的是只选一名瞎子，老师傅由年龄稍大的人担任。“老师傅”坐着不动，负责捂着“瞎子”的眼睛，不让他看到过客的动作；“瞎子”负责猜测过客是谁、模仿的是什么动作或动物；过客负责模仿各种动作从“瞎子”眼前经过。过客模仿动作经过时，老师傅根据过客模仿的动作喊叫，挑担子的过去了（模仿的是挑担子的动作），骑马的过去了（模仿的是骑马的动作），牵牛的过去了（模仿的是牵牛的动作），推车的过去了（模仿的是推车的动作）等等，过客过完后，老师傅问瞎子，你要哪一个，瞎子任意说出一个，并猜测模仿人的名字，猜错的话继续当瞎子，游戏继续进行；猜对的话，被猜出的过客当瞎子，瞎子当过客，游戏继续进行。

打瞎驴 先推选一个瞎驴，一般都是年龄小，或者是女孩子，用手巾勒住眼，其他人围成圆圈，乱打乱抓来回推瞎驴，瞎驴根据打者所处的方位距离伸手去抓，如抓住打者，打者当瞎驴，抓不住继续被打被抓，直到抓住人为止。

藏老猫 即由几个孩子推选一个人，为寻找的人，叫树墩，其他人为藏猫的人。树墩被老师傅捂眼，其他人跑散藏起来，等藏好后，老师傅松开手，树墩寻找，找着谁谁当树墩继续进行。

打抬 划一根横线，两人各拿一根木棍，大压小，谁输谁放到地下，另一个人用木棍打放在地下的木棍，打过去，木棍属于自己，打不过去让对方打，谁打过去谁赢一根木棍。多为男孩子玩。

刁纠两个人各抬起一条腿抓住，去撞击对方，谁脚先沾地谁输，男女孩子都玩。

抓子 用砖头砸成小块，或者是用小石子，由两个女孩子玩，用五个子，先拼（bin）子，每人抓起五个子撂起再用手背接，谁接住的多谁当头起，先摆一个子（叫猴），抓起地下的四个子再接住撂起来的一个，如果抓不起来四个子或接不住撂起来的那个子，为败，让给人家抓。一次比赛叫“把儿”，第二步比赛“捻儿”，先撂起来一个子，然后抓三个，接住撂起来的子后，再抓起地下的那一个，如果接不住或抓不完子为败，另一个人接住从“捻儿”开始比赛。第三步是“对儿”，即先撂起来一个子，先抓两个接住子，再撂起来抓剩下的一对，如果不能完成即让给对方，对方也从“对儿”开始，如完成，接着是“条儿”，条儿是撂起“老猴儿”先抓一个，再撂起“老猴儿”抓三个，依此进行，谁先完成谁为赢。

踢毽儿 用布包起两个制钱缝成墩，再用鸡尾毛筒缝上，插上小鸡毛即成，多

为女孩玩，伸手找班，都伸手，手心为一班，手背为一班。然后伸指头大压小，比赛开始，踢法为逐个人踢，五下一落（即踢够五个，毬儿要落在脚面上），十下一吊（即把毬儿踢够十个，要把毬在背后踢到前面），败者为输，由一班的人接着踢，如再败则由对方踢。

跳绳 男女孩子都玩，有单跳、双跳。单跳是一个人抡绳一个人跳，双跳是两个人抡起绳子跳，有一个人跳，有双人跳，有一条腿跳，有两条腿跳，有立着跳，有蹲着跳，双人跳还两个交叉换位跳，先分班，以伸指头比大小，大先小后，先者跳后者抡绳，绳绊住脚为败，让给对方跳，各班跳的下数累计计算，谁跳的多谁赢。

在农村庙会上，还有“撂圈”“扎绳”“猜瓜籽”“打玻璃球”“摆棋阵”等营业性活动，这里边含有很大成分的骗术。也有一些带有体育性质的营业性活动，如“气枪打气球”等。

第三节 游戏竞技器具

有一些游戏竞技活动器具是由企业制作出售的，如象棋等。有些是民间个人制作，如骨牌，这是国家已明令禁止，活动者少，就由自己制作。多为竹竿板，不易碎，所以有“扳竹竿板”的俗语。后来用胶木制作，塑料板。

秋千不论是架子秋千或者是猴秋，由群众自己制作、搭建，或者购置一些必要用品，等过完元宵节，春节结束后再拆掉，各自收拾回自己家的东西。

儿童玩的器具，踢的毬子、沙包，均由自己或家人帮忙制作。只有下跳棋的弹子（玻璃球）、军棋等需购买。

斗鹌鹑的鹌鹑则由自己捕捉、驯养，也有从外地购买回来驯养教习，斗鸡用的鸡也是斗鸡人喂养，当鸡快养成或养成后，也有在同行爱好者中买卖的，选鸡苗、喂养、教习也是喂鸡人担当，狗多半是从外地购买，买回来的狗基本上就可以参加比赛。

第五编 文艺民俗

第一章 民间艺术

第一节 民间艺术的传承

长葛一带的民间艺术具有传统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它所涵盖的内容有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戏曲、民间曲艺、民间美术等。这些传统性的民间艺术活动，在明末清初处于鼎盛时期。据有关史料记载，传统的民间艺术活动多在年节、庙会期间举办，重大节日或大的庙会上还会举行比赛。清朝同治年间，长葛县城就举办过多次民间艺术表演、比赛活动，上百支表演队伍齐聚县城，有舞蹈、有说唱，吸引数十里的人前来观看，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挤扛不动。尤其是石固镇，南北寨四街均有狮子社、龙灯社。

民间艺术的表演团队多以“社”“会”命名，如“同乐社”“童灯会”等，都是民间组织，有的是以村成社，也有几个村或跨乡跨县组成社团的，如石固申庄的铜器社就由长葛、新郑、禹州几个县组成社团。其道具购置均由富户捐资或民间收取，参加活动的人是尽义务，不要报酬。有些社团也在春节期间向商贾、富户拜门收取礼金，以补支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文化部门组织下，除在古庙会活动外，还利用重大节日和丰收之后开展活动，有些大的企业开业庆典也邀请民间艺术团体助兴。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民间艺术表演被视为“四旧”而被禁止，烧毁道具、批斗老艺人、解散社团。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间艺术活动才逐步恢复，而且在文化部门的要求指导下，比以前有所扩大。自20世纪80年代末，民间艺术团队除在本村、本地表演外，每逢元宵节，县文化部门还组织民间艺术调演、展演比赛，统一指挥，分街定点，固定团队表演路线，县文化部门组织的评委按标准打

分，表优奖先。

到20世纪90年代，县文化部门对民舞、民乐开展普查，抢救保护濒临灭绝的项目，使民间文艺活动持续发展。同时民间艺术团队的活动进入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婚丧嫁娶，要请民乐队、腰鼓队、盘鼓队表演；商店企业开业，要请盘鼓队、狮子、龙灯在大街巡游作广告，过去纯粹农民自娱自乐的活动性质步入商业操作，而且形势、规模、艺术品种都较之过去有很大的发展，艺术技巧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使之更加完美。

第二节 民间艺术的种类

长葛的民间艺术名目繁多，源远流长。诸如门画、壁画、泥塑、石刻、纸扎、烟花、鞭炮、唢呐、篾篾等，多是祖传绝技，驰名乡里。舞蹈则有狮子、龙灯、竹马、旱船、抬阁、肘阁、小车、高跷、独杆桥、毗牙官、扯犟驴、二鬼摔跤、跳假神、老背少、莲花灯、铜器舞、大头和尚戏柳翠等。新中国建立前后，解放军又带来了腰鼓舞、秧歌舞、打花棒等。

抬毗牙官

靳全州

我的家乡“乐神”葛天氏的故里后河及长葛市周边一带，流传着一种独特的民间文艺“抬毗牙官”。它是一个参与表演的人数较少，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十分搞笑的文艺活动。

葛天氏时期，人们在捕鱼、打猎获取胜利以后，大家为了庆祝胜利，往往会高兴地把有功人员围拢在中间，尤其是在特别兴奋时，甚至会由几个人把他共同托住撂起来，接住后，重新再撂起来，这样重复多次。被撂起来的人在空喜笑颜开，有时候还会在空中翻跟头，逗得众人大笑，这是该项活动的雏形。

后来这种活动大多在春节和灯节期间表演。它所使用的道具是这样的：是把一根四、五米长的圆木（独龙木）在三分之一处，砍一约十公分长、约两三分深的弧形面，垂直固定在一根碗口粗、约两米长的圆木（也叫横梁）上。横梁的两端在一条线上各钉两个露头约十公分长，相距约十五公分的铁钉。横梁上的两个铁钉又卡在垂直的两根直径约十公分、长约一米七的圆木（也叫抬杠）中间。抬杠有四个

人抬。在独龙木的梢部，固定有一只小木箱（作为案桌），案桌后面固定有一把小靠椅。在独龙木的底部，横向垂直固定有一根一米长、直径约十多公分的操纵杆。

表演时，整个框架由四个人抬着。独龙木后部的操纵杆由两个强有力的人同时上下扳动，使独龙木的梢部上下忽起忽落。扮演吡牙官的演员，必须是身材瘦小，胆大而又机灵的人。演员身着戏剧官服，头戴官帽，面部化妆，带着稀疏的短胡须坐在小椅上，左手拿一把折叠扇（也叫合扇）。木箱上钉一个小圆钉，圆钉上用细绳子拴一块小木板作为惊堂木，在独龙木的起落中不时地拍在木箱上，同时还要发出“都——都”的怪叫声。并且还要不时地摇着扇子做出多种十分滑稽的动作，出尽洋相，以此引逗观众欢笑。

当时他们表演的有：“牙官跨街”、“吡牙官断案”、“吡牙官调戏妇女”（扮演者逗嫂嫂们）、“吡牙官玩官帽”（在买到官职后得意忘形，有的演员还带唱）等节目。我就看到过“吡牙官”断案、“李豁子”拦街离婚的表演。

这些优秀的民间文艺节目和独特的表演形式，鞭挞了历史上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也充分反映出农民在获得解放后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时感情的释放，因此记忆犹深。

踩高跷

靳全州

关于高跷的起源，学者们多认为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与沿海渔民的捕鱼生活有关。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尧舜时代以鹤为图腾的丹朱氏族，他们在祭礼中要踩着高跷拟鹤跳舞（见孙作云《说丹朱》）；考古学家认为，甲骨文中已有近似踩跷起舞形象的字（方起东《甲骨文中商代舞蹈》），两者可互相印证。

任何艺术都源于自然和劳动中，踩高跷也是人类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产物。在我们家乡后河——乐神葛天氏故里有一种传说：在远古时期，葛天氏族为了用手摘到树上高处的果子，他们就把带叉的树枝绑在腿上，既增加了高度，又可以灵活地到处移动，大家看着好笑，后来就把它变成了一种娱乐形式。人类起源于劳动说，还可依据晋人郭璞的另一条注释：长臂国人在赤水之东，身体像常人，但臂长三丈，长脚人常负长臂人入海中捕鱼。由此可以联想到，脚长是绑扎着木跷，手长是手中拿着长木制作的捕鱼工具，他所描绘的酷似现今居住在广西防城“京族三岛”的京族民。在寒冷季节捕鱼，为避免海水弄湿衣裤而踩着木跷在浅海中撒网

捕鱼的形象。另据《艺风》杂志记载：武昌的筷子街和箍笼街，因地位低湿而常被水淹，那里的人们每当水淹时，差不多都踩着高跷来往，这又是高跷源于劳动与生活的记载。

高跷本属我国古代百戏之一，早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我国最早介绍高跷的是《列子·说符》篇：“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跌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从文中可知，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高跷就已流行。表演者不但以长木缚于足行走，还能跳跃和舞剑。

高跷分高跷、中跷和跑跷三种，最高者一丈多。高跷道具的制作最为简单，一般用四至六尺长的条木制成，有的则有丈余。在距离顶端约一尺二寸处有一木托，演员将双脚分别踏在木托上，把双腿用布带绑在木棍上，化妆成各种人物，一人或多人来往逗舞，由锣鼓和民乐伴奏，表演出有趣的动作或故事，北京称为“高跷会”，黄河流域则称“踩高跷”，且有文跷和武跷之分。文跷演员主要表演走唱，有简单的舞蹈动作；武跷演员踩低跷则能表演倒立、跳高桌、叠罗汉、劈叉等较难的动作。

每到农历正月，一队队高跷队，在腰鼓、小钹锣、大小钗等打击乐中穿街而过。人数不定，一般十几人。低跷走在前面，高跷走在后面，演员均是传统戏装打扮。高跷的队列在街头行进中，一般采用一字长蛇阵的单列，在繁华拥挤地段采用双人并列队形，步子变换为走八字。表演有“小旋风”“花膀子”“鹞子翻身”“大劈叉”等难险动作。高跷表演常常在农村冬闲时，农民自发有组织地进行排练。

武高跷，头跷为指挥，二跷是领队，戏曲人物居中，最后由丑汉压阵。表演首先变换各种队形扭动，然后表演“过仙桥”“跳桌子”“跳双凳”“大劈叉”等各种难度较大的动作。有的还表演“蹲走”“跳桌子”“鹞子翻身”“越头跳”“后滚翻”“单腿跳”等技巧动作。

这些高跷的表演时间，一般都在农历正月十五左右闹“元宵”期间，高跷是整个活动中的一种表演形式。因为它机动性大，行动比较自如，所以可以在大广场中表演，也可走街串巷。

踩高跷这种民间文艺表演，深受群众欢迎。五十年代初还能看到，“文革”以后，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销声匿迹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各种民间文艺又萌发青春，踩高跷的表演又出现在了喜庆节日的活动之中。

划旱船

靳全州

划旱船又叫“采莲船”，是中原传统的民间文艺。在家乡乐神葛天氏故里后河，更为流行。他们通常由四至六只旱船和竹马队分别组成方阵，各自一边，显现出水陆并行而配合演出。旱船演员化妆后手执划板，竹马演员化妆后跨在马上和旱船一对一配合，各自变换队形，随着由锣鼓点伴奏而表演。

划船表演的内容一般是戏曲唱词，但也有他们自编的。女性演员身穿红绿衣，渔家女装束，由一位老艄公手执划板带队。在表演时，按照戏剧表演的走路队形不断变换。老艄公头戴草帽，拿着划板腾挪闪耀，舞桨抖须；撑船（采莲）女步履轻盈，在布幔的掩遮下船身晃动，宛如行在水中。旱船演员由一马童带队，马童不时地在岸上向撑船女嬉戏或挑逗；而撑船女则不断地作出向岸上用划板拍水的动作，那马童脚下被水溅得十分湿滑，故而做出翻转腾挪的滑稽动作。整个耍旱船分两部分：前半部分即如上述，穿插进行舞蹈。后半部分进入高潮，彩船一字排成临岸停泊状，而岸上的马童做调戏动作，老艄公愤怒地和撑船女与马童展开搏斗。竹马演员则奔跑助威，最终马童被老艄公打翻在地，竹马队逃跑，旱船队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而结束。

旱船的制作比较简单：船板周边是用小竹子或竹批扎成，中间有两根横撑，四周分布有六根斜立撑，上边扎圆形船顶固定在斜撑之上，然后用布做一彩色伞形船顶，船板用彩色纸糊上，中间留一个能钻进人的洞。船体四周用黄色绸缎幔起来，布幔下半部分画上水的波浪和莲花、莲叶，在水波下面还画有鱼、鳖、虾、蟹、蚌等，演出富有乡土气息，真实感人。

中原的划旱船表演，一般是在节庆之日（特别在春节、元宵节），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在表演时的唱词也在不断地变换内容，现代歌舞也融进了古老的文艺之中，这正是对葛天文化的光大与传承。

推小车

靳全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主要

发祥地之一。在葛天氏故里的长葛市后河镇，各种各样的民间文艺活动历史源远流长，“推小车”就是其中的一支奇葩。

“推小车”的表演道具比较简单，由两个人表演。小车是用高粱秆或干桐木竿扎成框架，上面和两边用黄布蒙上，在前边两旁靠下画上黑色车轮，上面中间挖一个圆洞，扮演老太太的演员，上身需要穿上用蓝布特制的道具服装。其上衣下边用破棉花或稻草扎制两条小脚老婆腿，系在演员的腰前，因为有大蓝布衫罩着，酷似老婆盘腿坐在小车上边。其实扮演老婆的演员站在中间配合推小车的老翁进行表演。其表演逼真、幽默、滑稽，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

“推小车”的表演，往往会同“竹马”、“旱船”、“腰鼓”、“肘阁”等，组成庞大的演出阵容，在春节、元宵节前后或重大节日时进行演出，有时候也专门在欢闹的人群围成圈后单独表演。在表演时，两个男演员要化妆成一对老夫妻，老汉头系白毛巾，带着假胡须，肩上搭着小车架着小车，老婆头戴绒帽，帽檐两鬓旁插两朵大红花，两只由道具制作的“三寸小金莲”盘腿坐在小车上，左手按着一个小包袱，右手拿一把折扇，上衣内肩上挎条布带，布带两头系在小车的两梯上架住小车，两人脚步相互配合一致（实际上是由两个人抬着小车），做出行走、上坡、下坡、拐弯、侧歪、颠簸等一系列仿真动作，老汉还不时地做出气喘吁吁吹胡子的滑稽表情，老婆也好似真的坐在小车上，故意表现出卖弄风情的挑逗。

两个演员在表演时还有唱词，基本上用豫剧、曲剧等地方戏唱腔。以前的唱段有“走亲”“逃荒”“赶会”等；后来新增了“进城”“游玩观景”等新颖节目。他们的唱词由演员随意编唱，一旁有唢呐、笙、铜锣、节梆伴奏。譬如：（男唱）“老汉今年我五十多，俺的老婆我推着。（女唱）你不推我谁推我？如果别人要推我——（男问）咋着？（女唱）你肯定要——（男问）咋着？（女唱时并用折扇指着老汉的鼻子）把那醋来喝！”逗得观众前仰后合，捧腹大笑！

这种民间文艺的表演方式，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的更新，在现在的戏曲或影视剧中，已经出现了以自行车、摩托车、轿车等现代化代步工具充实剧情，真实地表现生活。但是，通过古老的“推小车”表演，则能够充分地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它能够利用幽默、搞笑的表演，来讽刺鞭挞封建社会民不聊生，背井离乡的穷困生活，同时也能够体现出相互关心，结伴到老，永不分离等和睦的夫妻关系，以及劳苦大众对幸福生活的盼望和向往！

第三节 民间音乐

自古至今，长葛境内广为流传的民间音乐有民间打击乐器和民间唢呐音乐。这些民间音乐过去常在婚嫁、丧葬等民俗活动中和古庙会的祭神送鬼等迷信活动中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部门的指导下，每当节日盛会，城乡皆可听到高亢激昂的铙钹锣鼓声和清脆悦耳的唢呐鸣奏，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长葛的民间唢呐音乐，是以唢呐为主、笙做伴奏的中国古乐，俗称“响器”。新中国成立前民乐艺人被歧视，社会地位低贱，生活贫寒，他们的精湛演奏技能只是口传身教，没有文字记载，更谈不上树碑立传。民间音乐起源于何时，无法详细考证。据调查，清道光年间长葛县文胜班的乐队中就有唢呐伴奏。到民国初年，长葛县仅有3个唢呐班，16名艺人。这些民间唢呐班常用于婚丧嫁娶及庙会活动。当时的名艺人有陈白化、朱木妮、赵安营等。他们演奏的曲牌有《双蝶翠》《柳叶筋》《菠菜叶》《翻四调》《老八板》《小开门》《大红弦》《哭皇天》《山坡羊》《狗撕咬》等。新中国成立后，长葛的民间唢呐音乐班有董村、石象、南席、辛庄、刘村、老城等38名艺人。其中陈大法、毕丙信、朱森、李升、翟水全为最出名，其代表曲目有“云里游”“二黄帽”“打棒槌”“互相配”等。

1983年3月，县文化部门对民乐艺人进行登记时，已发展到18班，149人。7月15日，县文化局、公安局、物价局、工商局联合发出了《关于民乐管理的报告》，制订了民乐管理条例。9月召开了民乐艺人代表大会。

1984年成立了长葛县民乐协会，民乐协会办公室设在文化馆。

1985年，全县民乐班发展到26班，艺人226人。8人参加许昌地区首届民乐汇演，并获集体二等奖。

1986年至1987年灯节有24个民乐班在县城表演。到2018年，已发展有民乐100多班，从业艺人有1000多名。

第四节 民间舞蹈

一、狮子舞

此舞遍及全县。它既能表现雄狮的勇猛性格，又能表现狮子的温顺神态。狮子